

JINHEHUAN AIREN

金合欢爱人

兰子二著

阴差阳错的爱情
无性婚姻
有情人终不成眷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兰子=著

金合欢爱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合欢爱人 / (澳) 兰子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500-0349-1

I. ①金… II. ①兰… III. ①长篇小说 - 澳大利亚 - 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728号

金合欢爱人

兰子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特邀编辑	万仁荣
责任编辑	赵 霞 王彦山
美术编辑	雨 葭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60mm 1/32 印张 9.5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349-1
定 价	27.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2-71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CONTENTS
录

001	第一章	出国
022	第二章	尘缘
051	第三章	春日迢迢
081	第四章	归去来兮
109	第五章	飞鸟
149	第六章	西风古道
182	第七章	不是江湖
210	第八章	覆水难收
249	第九章	梦里寻你千百度
267	第十章	向阳花开

—

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中醒来，心情很好，今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赶时间，我赖在床上想着昨夜的梦。在梦里，我坐时光机回到1988年，在悉尼国际机场，从飞机里走出来是长长的走道，浅绿色的地毯，踩在上面温软轻盈，像走在云端。我慌张懵然，眼前的世界新奇、陌生，格格不入。以前看过的一些外国电影，下飞机是从舷梯上走下来的，现在我直接从飞机里走到到达厅。随着人流往前走，曲里拐弯，踏上电梯被运下去。我站在小拖车后面，紧拉着小拖车。小拖车上绑着我的手提行李。到地面时，小拖车的轮子在传送带接口处被卡了一下，我身体随着前行的惯性从小拖车上翻过去——“哇！”听到人们的惊呼声，来不及羞愧已经被人拉起来，那人又把我的小拖车也拉起来，紧跟着问我有没有事？我摇头连说：“没有。没有。”从难堪的境地里摆脱出来，想到该道谢时，那人已经走远。我看到一个很瘦很瘦的身影，竹竿似的细腿，有点罗圈，印象中是个香港男生，二十来岁……

来到海关处，随着长长的人流出关，等着拿行李。我直愣愣看到最后一件行李被人提走：“我的行李箱呢？咋不见我的？”我东

张西望，紧张得心几乎要跳出胸膛。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不见行李，不知该怎么办，想想：“再等等吧？说不定那个口子里马上就吐出我的行李箱来。”我的行李箱特大，里面有电饭锅，有毛巾被，有快熟面，还有……昨晚在香港启德机场登机时被说行李超重太多，让补交很多的钱。千来块港币对于1988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我来说就叫很多。那时候的富豪叫万元户。匆忙中我记不清扔掉了些什么，最后还是超重5公斤。送我机的爸爸的香港朋友跟地勤好说歹说，让她看在我一个年轻女生即将离家千里万里，独自到鬼佬的国度讨生活的份上，放我一马。她也许是位母亲，眼睛猛扇几下，好像伤感了，什么也没说，递给我登机牌。我年轻的心带着侥幸的满满的兴奋向送行人挥手说再见。爸爸说我心硬，别人都会因为要离开父母而大哭，我却兴高采烈。

“行李也许因为超重没让随机？走水路要三个月，那我怎么活呀？所有的家当，包括未来三年的内衣裤，五年的感冒药都在里面。”

我胡乱猜想着，焦虑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行李好像到了爪哇岛似的不见踪影。

“糟糕，信里约好钟耘十点钟接机。”

看刚刚调过时差的手表，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这班国泰班机于昨夜11点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正点今早9点着陆。正急着，见有海关人员走过来，我英语九百句是背得很熟的，可是没有实战经验，没跟真正的老外练习过。打好腹稿等他们走到跟前，想迎上去问，无故的心里一怯，到了舌尖的话愣是被生生咽回肚子里。我只好等着，茫然间盼来一位华人职员，讲话满口“而已，而已”，听着让人别扭，后来才知道这是典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华语。他告诉我们这些不见行李的旅客：“行李在下一班机里，要到中午12点才到。”

“你们回家先，下午一点以后来国泰的窗口提行李。”这人说。

我来不及有更多的考虑，狂奔出口处，边走边扬头目光像风一样在接机的人群中刮来刮去，寻找印象中的钟耘。最后一次见钟耘，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是十四五岁的样子，离现在都快十年了。我疑惑慌张的眼光落在不远处一张A4纸上，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拿纸的人是个三十出头的陌生男人，瘦小精干，皮肤黄中带黑，典型的热带人。眼神交流，彼此确认是自己要找的人。我疑惑——他不会钟耘吧？老得这么快？

他看我满脸的问号，就自我介绍说他叫汤姆，钟耘的同事。钟耘今天上班，请他帮忙接机。“没想到班机晚点这么多！”他抱怨，“我十二点要上班，现在已经十一点。”他不停地说，声音里透着强烈的不满。我读到他的优越感，一个老华侨对初来乍到的“新金山客”的优越。他肯抽出黄金样的时间来接我机已经是极大的恩赐，我竟然迟到？误他事儿？在悉尼，除了退休和失业的人，没人会空闲得像钟摆一样优哉游哉地摆动，每一分钟都有安排，包括睡觉时间。睡觉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我跟他解释丢行李的事。他犹豫片刻，说：“这样吧，你人生地不熟，就不要来回跑了。就在这里等行李，拿到行李自己打车走。我把地址写给你。我赶时间，得马上走。”说完，匆匆写一纸条递给我，匆匆走了。

我拿到行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跟着人流排队上了指定的的士。司机是一个中东人模样的中年男人，肚子像孕妇，差不多顶到方向盘上。我还是不敢开口讲话，把写有地址的纸条递给他。他看了，有点想笑的样子，还我纸条时说“谢谢”。见他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我一直提心吊胆地坐着，眼睛直瞪车窗外的路标看。其实那些路标对我毫无意义。我根本就看不懂。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多时间里，悉尼国际机场每天都接待几批像我这样的中国旅客。

人们出国各有各的原因和目的。我出国完全是任性。当年失意于暗恋多年的班上画画最牛的男生，愤而出国，想要的效果就是他后悔。

1988年的我，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只到看三毛小说的水准，想象中的悉尼是钢筋水泥的人造森林。这个国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吗？不是在六、七十年代，人均收入曾经排行世界第三吗？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遍布的高楼大厦是用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铸造的吗？我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学成绩不错，从初中到大学的政治课都学这个。

中东司机把车开得不快不慢。周末的午后，路上的车像天上的鸟儿偶尔飞过一两辆。真正的悉尼基本上没什么高层住宅，普遍只有三、四层高的公寓，更多的是带前后花园的平房。房子之外就是树林。有些地方，房子前后花园不能少于几棵树，都有规定。就算把房子买下来，也不能乱砍花园里的树，得向区政府申请批准。

我目不暇接，一路的树呀，花呀，红房子呀，异国风情海浪一样一波波地冲击我的心房。我用三毛情怀接纳这满目新鲜。我的孤独寡闻与当时澳洲人对中国内地人的了解相比，我觉得不丢人。澳洲人以为中国男人还梳辫子呢。在悉尼落脚后听的最多的英文句子是：“你从哪里来？”讲的最多的英文是：“我从中国内地来。”对方这时会像大人关心小孩似的：“你喜欢澳洲吗？最喜欢澳洲的什么？”再下来免不了挂上白痴样的笑容：“你们中国男人梳很长的辫子，是吗？”我心情好的时候会开他们玩笑：“他们辫梢藏着刀，如惹怒他们，头一摆就能杀了你！”

这也怪不得他们，我来了四五年了，还看到电视SBS民族频道不管是纪录片还是电影，中国内地的人都活在清朝，男人穿长衫，梳辫子，辫子要不是盘在头顶就是拖在背后；女人穿得黑乎乎的，戴斗笠，像越南人。

车突然停在一条静街边上。“到了。十五块钱。”司机回头对

我说。

我愕然：到了？这是哪跟哪呀？静悄悄的马路两边是一溜的三层楼公寓，水红砖墙，没有批挡、铁栏杆的阳台。公寓前面路边零落地停着些破旧的轿车。没有声音，没有人，就算是阳台上也不见人影。虽然很茫然，我还是装着自信的样子，跟外国人没接触过，但三毛的小说看得多，知道“西风不相识”，洋鬼子欺软怕硬。我从钱包里小心抽出一张票子递给司机。那是多少钱？他会不会找我钱？我要不要给他小费？我没把握，对澳洲货币面值还没搞清楚。

司机把行李箱从后备箱里提出来交给我，说了声“再见”就开车扬长而去。我拿出地址来看：5/15，8街。8街可以肯定，这就是8街，可5是房号还是楼号？抑或15是房号还是楼号？我决定两种都试一下。先找5楼15号房，没人，再找15楼5房，也没人，有一纸条：新来的房客，对不起，我们要上街买东西，预定5点回来。托尼，12点30分。

我拖着超重5公斤的行李箱，背着不限重量随身带上机的包包，坐在公寓前花园的矮墙上等。我知道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反，现在是十一月底，来时家那边已经是冬天，这里应该是夏日炎炎？在香港机场我换上当时很流行的牛仔衣牛仔裤，这会儿感到凉风沁沁。看路边的树叶碧绿湿润，刚刚下过雨？抑或是因为饥肠辘辘加上缺觉？昨晚在飞机上不独吃不惯西餐，也因为出国的兴奋填充了五脏六腑，脑神经过度兴奋而无法入睡。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喷嚏。我双手抱肩，眼神空洞。

街的一端走来两位巡警，经过跟前，对我说“Hello”，我也回应“Hello”，心情大好。不是因为我的澳洲第一声，而是他们实在帅，像电影里二战时期德国士兵或苏联红军。我只看过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战争片。

不知等了多久，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了。那两位街警又巡回来了，他们经过我的跟前，其中一位问：“How are you? Do

you need any help?”我听懂了，他们是问我需不需帮助，我说：

“No,thank you.”英语九百句没白背，希望他们能听懂我。他们向我笑，走过去。看来他们是听懂了。看表，才三点多，离五点还有一个多小时。

“时间咋就走得这么慢呐？”

我觉得快要晕倒了。好久好久，终于等来一辆橙红色的三门小丰田。我目测这车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造的，车身的残旧足以说明车龄有十五年以上。车突然停在我面前，从车里爬出两人，一男一女，华人。男的三十开外，中等个儿，不胖不瘦，有点许冠杰的气质，外形也有点像。浅灰短裤粉红Tee-Shirt，脖子上披件白衬衫，袖口在前胸口打个结。女的二十出头，鸡蛋脸，长发披肩，个儿特高，几乎与男的一样高。迷你牛仔裙，亮黄短袖衬衫前下摆打个结，青春气息逼人。男的上下打量我，笑问：“你就是新来的吧？安平？”

“嗯！”我说。

“你好！我是托尼。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什么时候到的？我们等你等到十二点多才出去。钟耘租房子的时候说你大概十一点钟到。我们实在不能再等了，再不去买东西店铺就要关门了。”托尼说着手不停地把物品一袋袋从车后备箱里提出来，重一点的自己留着，轻的交给那女的。他好像只管说，并不要求我回答。我简单告诉他丢行李的事情，再为我的迟到道歉。

“走吧。”托尼说着带头往家走，那女的跟上。我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满心的不高兴。托尼为了买他的什么破菜，不惜牺牲我宝贵的时间。我可是二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二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我可是坐在门口等了他三、四个小时的呀。算我倒霉，出国的第一个回合就让他给了我个下马威。

生活不是诗，不是童话，不是我眼睛看到的红房子一样的美丽。我的自怜自宠很快就被生活扳倒。一个星期买一次菜是

悉尼人的生活模式，我不久也服从了这种生活模式。像托尼一样，星期六买菜成了生活中头等大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悉尼，人们的生活模式颇具田园风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期五只工作到下午一点。星期六，星期日，除了大的一两家连锁店，像WOOLWORTHS, COLES，几乎所有的店都关门，包括银行，邮局和便利店。晚上连酒吧都关门，只有星期四和星期五例外。星期四晚上是购物时间，杂货店，肉店，便利店都开到晚上九点，大多数人下了班以后直接就去把下一周的食品买了。星期五是喝酒时间，也是发工资的时间。工资是每周一发，绝大多数机构把发工资日定在周五。无论男女，周五晚上铁定要到酒吧喝酒狂欢，会旧友识新友，单身男女可以在这场合找到一夜情。周末，如果有太阳，家人朋友就可以到海边晒太阳，烧烤；没太阳的日子，就在家喝酒聊天，看澳洲足球，也就是橄榄球。或者到健身房去，大人桑拿，小孩游泳。

突然，那女的回头向我嫣然一笑：“您好，我叫文迪。上海来的。您呢？”

“深圳。”我冲她笑，心想：哦，原来是前辈呐。

我跟着他们进门，托尼指明我的房间，说：“这房间周租八十元，包家具、水电。住两人，一人四十。与你同住的另一女孩明天来。”我看看桌子、椅子、衣柜、床，任何一件都可以与家里乡下奶奶老房子里的家具媲美。尽管出国前已接受过无数的艰苦教育，尽管我彻底地知道出国是要吃苦的。可我没法把托尼指给我看的家具认为是真的家具。心里暗暗埋怨钟耘不为我着想，租这么贵的破房子，不是说二十块就能租到房了吗？我极度疲惫，快虚脱了，贵就贵吧，睡一觉再说。也顾不上床垫上的水迹了，我行李一放，倒床就睡着了。深夜醒来，饥肠辘辘，从行李箱里翻出快熟面冲上一杯。正吃着，钟耘敲门进来。夜深故人来，甭提我有多高兴了，赶紧给他让座。他一见着我就说：“能见到你就好。我一听汤姆说没

把你接回来就急了。如果把你弄丢了，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这不，一下班我就赶过来。”我忙着烧水准备泡茶，没间接他的话。钟耘见状，阻止我：“你别忙，我没时间喝。我得赶十二点最后一班火车回去，误了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五点才有车。”

我追问：“那我们什么时候把账给结一下？该我还你垫上的房租和押金。”

钟耘想了想，说：“我明天要上一整天班，后天星期一，我下午上课，晚上上班，上午我请你到中国城饮茶吧。一来算是为你接风，二来带你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带你去银行开户口，完了一起去学校。我们是同一间语言学校。那时我们算账。”说完匆匆赶火车去了。

钟耘，我母亲同事的儿子，大我一岁，不熟，出国前见过几面，都是很小的时候。记忆里没讲过话。他比我早三个月来到澳洲，我母亲就把我托付给他。在我母亲的心里，他就是那根稻草。

二

第二天，同房的女生来了，叫颜然，北京人，十八岁，长得像王菲，样子有点刁，高中刚毕业就出来了。我们乘同一班机来悉尼，昨天她先到她表弟那儿，今天早上由表弟开车送她来，房子也是她表弟帮忙租的。言谈中，我知道她表弟叫尼柯，当然，这是他的英文名。几乎所有来留学的中国人一落地就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就算个把没英文名字的，到了语言学校，英文老师也会要一个英文名字，说中文名字太难读。他半年前来的，高中还没毕业。现在在读英文，准备明年到塔斯马尼亚大学读物理。塔斯马尼亚是澳洲南端的一个岛，近南极洲。她还告诉我她母亲是归国华侨。姐妹俩1952年回国，瞒着父母，带着两箱衣服和几包热带农作物的种子随一群爱做梦的青年坐船回国参加建设。她妈是姐，1958年大学毕业嫁个教授。妹妹随后嫁个大官，官有多大，她没说，就是表弟他

爸。看她表弟的作为，估计官不小。那年头，来澳洲留学不打工只读书的中国内地人，凤毛麟角，我所认识的人中只有她表弟。从她的语气中听得出她对表弟极为羡慕，也倍感自豪。

我出国前做足了功课，索查有关出国留学的读物，从中得到前辈们提示，说，一人一周的花销大约需要五十元。我悄悄算了一下目前所需的开销，单是房租就四十元，还有交通费，火车周票到城里，五块，食物，十块，电费、电话费，至少也得十块。远超出五十块的预算。这地方不能住，得搬走！我跟颜然把搬家的想法说了，她有同感。于是我们约好一起找房子搬走。

星期一到学校报到，我在布告栏上寻找，看空房出租或者找合租伙伴的信息。看到一招租广告：“金匙区，四街，两居室公寓，一房招俩不烟不酒、爱干净女生，周租\$50。”我们正好住在金匙区，我马上把广告撕走，到公共电话亭按广告上的号码找一个叫麦克的人，听口音，上海人，我们约了晚上六点半看房子。

我和颜然准时敲开麦克的门。

“呵呵，来看房子的呀？请进。”给我们开门的是麦克，单眼皮，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个子也是瘦小单薄型的，不用介绍都知道是上海人。他的普通话带很重的上海口音。

进门是客厅，除了祖母级的老电视机、特破的大沙发外就没别的家具。厅显得特大，加上厨房，二十五、六平米左右。厨房是开放式的，在客厅的一角上。房间一大一小，大房间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住着三位男生：麦克、罗伯特哥俩和大卫。小的房间十平米左右，在招租。整套房子一百一十块，麦克租下来，大房六十，小房五十。

麦克告诉我们他们兄弟俩早在1987年就来了，先到的墨尔本，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最近才搬到悉尼来。大卫，北京人，早我们三个月出来的，与钟耘差不多时间。除了麦克和罗伯特，我们都差不多年纪。麦克大我们一轮，三十六七光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的复

旦大学生。罗伯特大我们六七岁吧？

麦克还告诉我们住这房子要守的规矩：卫生轮流做，包括倒垃圾。电话打一个记一个，谁打谁记，电话单来时结账，长途电话到公共电话亭打。

我们满意彼此。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没多大的选择余地：房间是空置着，这就意味着他们仁承担额外的房租。尽快租出去是他们的迫切愿望。我们也一样，托尼那儿我们一分钟也不想多待，恨不得马上就搬走。省钱是原因之一，原因二是看不惯他带文迪回家睡觉。每次我大清早看着文迪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光着两条腿，一件大Tee-Shirt刚刚盖到屁股，不穿胸罩，真为她感到难为情。她倒好，坦荡荡，悠悠地晃荡。一次，我与她同时在等电壶烧水的当儿，不知她是故意炫耀自己的青春胴体还是藐视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给我摆了一个芭蕾舞白毛女的标准动作：一脚着地，另一只脚往后高高抬起，上身高挺前倾，嘴里嚷着：久了没练功骨头都生锈了。

我几乎晕倒。

从麦克那儿回去，我们就通知托尼两个星期后将搬走——租房时说好的，退租，甭管谁退谁，都要提前两周通知。托尼听了我们的搬家通知，老大不高兴，不过倒也没说什么。我刚来的第二天他答应帮忙找工作来着，现在说帮不了忙了。

托尼是越南华侨，1970年代中期越南排华时作为难民来到澳洲。据他所说，他家在越南是大富豪。他曾经被送到台湾留学，跟青山、邓丽君混过。说当时邓丽君还没红，曾经上赶着他的一个哥们，那哥们看不上她。一提到他的父亲就显得愤愤不平，说父亲恨他，父亲是个蠢蛋，不把钱给他，最后全给了共产党。他说的当然是越共。他在悉尼上岸时兜里只揣着五百块美金。我问他在悉尼是怎样生存下来了？他支吾着没说。我跟文迪混熟了以后，文迪告诉我托尼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是在唐人街给人拉皮条。文迪

还告诉我她和托尼是在飞机上认识的。文迪来留学，托尼送新婚的上海妻子回中国等澳洲的永居签证后返澳，俩人在飞机上遇着了，下飞机托尼直接把文迪带回家。文迪以为遇到的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目标男人，可以给她澳洲身份，于是她毫不犹豫从包里掏出母亲给她准备的避孕套。她母亲告诉她：她不漂亮，比起五十年代的母亲差远了。母亲要不是因为太漂亮被男孩们宠坏了，她这个资本家的娇小姐早就嫁给刚进城的解放军大首长了。那个时候呀，母亲想嫁哪个大官，手到擒来。年轻无知呀！唉！后半生遭的罪让母亲为当年的错失时机肠子都悔青了。母亲告诉她最大的本钱就是青春，青春若不用就浪费了，是存不下来的，重要的是要在澳洲留下来。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在第一个晚上，他喘着气从她身上爬下来躺在床上，告诉她说并不爱她，现在老婆怀孕了，还回了上海等签证，他需要一个床伴，她就是。她伤心，伤心上错了床。他答应带她交际，介绍一些专业人士或者做生意的、多金的有澳洲身份的男人给她认识。文迪衡量利害关系，想，做他的床伴，自己没损失什么，妈妈不说了吗？青春不用也会流走。要认识上档次的澳洲本土男人还得靠他。自己在工厂打工，认识的最牛的也就是管工或者老板。这些小作坊的小老板，跟工人没什么两样，起早摸黑，给工人开门倒垃圾，比工人还辛苦。于是就同意做他的周末女友。平时她不住这儿，周五下午托尼去工厂接她来，周日晚上送她回住处。

特世故的颜然说：“这样，文迪怎么有机会认识别的男人？她只能把宝押在托尼一人的身上了。”

我与颜然用超市的推车把两个行李箱从八街推到四街，用了五分钟。

我们见过另外两位寓友：大卫和罗伯特。罗伯特沉默寡言，高，瘦，小眼睛，不笑时也像笑。大卫小白瓜子脸，戴副深度近视眼镜，北京医学院毕业，好在他体形比较魁梧，否则我会当他是漂亮的女生。

我们聊的最多是找工作。找工作是留学生最热门的话题。初次见面我们就问彼此做什么工作？多少钱一小时？缺不缺人？能不能介绍进去？他们三个男生都有工作，颜然她澳洲的姨帮她找了份服装厂剪线头的工作，明天就上班。就剩我了。

在英文学校上课是愉快的，没有什么比不要考试的上课更快了。况且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不同国籍的同学，有日本的、韩国的、南美的、东南亚的。中国同学最多，其次是韩国的。日本的一般都是来旅游的，旅游半年就来学半年英文。有一次一位漂亮的小鬼妹老师说：“上海到底有多大？有多少人？你们每个人都告诉我说来自上海。”以澳洲的人口概念，她无法想象如果一个城市走了那么多人后会是什么样的。

下课后我们中国学生就聚在一起交流找工作的经验。有人告诉我，中央火车站附近有很多制衣厂，可以到那里问一下。我的学校离中央火车站不远，下了课我就走着去。问到一家要我剪线头的，按件计算，5分钱一件，从下午2点到5点，3个小时，我拿到五块钱。我来到中央火车站准备回家时，看到花店还开着，我用这五块钱买一束花回家。晚上打电话给英文班的同学，让他过来给我照张相，为五块钱留念。他在国内是照相的。

那家服装厂就不去了。

四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在找工作；八个星期过去了，我还在找工作。开始时，每天下课就买报纸，打电话，或者到社区工作服务中心。那里每天都放出一些新的工作需求卡，上面写着空缺的职位和编号。看到了就去登记。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得到面试的机会，运气更好的话就会被录取。麦克和大卫根据经验说，找工作完全靠运气，瞎猫撞死老鼠。这句话我在澳洲经验了二十年，换工作无数，每次都应验。很多同学也给我经验：直接上门去问。于是，周末我就与颜然，她想换个工资高点的工作，带本地图坐火车到工厂区一家一家地问。

找吧，总会找到的。不是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吗？用澳洲人流行的话说：Don't worry, be happy. 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不是还有两千块钱的银行存款吗？按五十块一周的花费算，我能坚持四十周，也就是将近十个月。那就安心读书吧。那时封封家信，妈妈都说好好读书，别急着找工作。我顺势就真的安心读书了。

后来我干脆下了课就回家睡午觉，晚上看电视学英文。

一天晚饭后，我和颜然到8街老地址查信，新地址已通知家人，有一些朋友没通知的仍然把信寄到老地址，认识了托尼的朋友史帝文，一个地道的越南人，中年，宽脸，高颧骨，蒜头鼻子，鼻梁短平，脸总是红的，好像永远喝醉酒的样子。他热情地要送我们回家，后来就自己串门来了。我们都说他是闲得无聊。

他看我老在家给那些打两份工、晚回家的寓友做饭，问我烫衣服的工作想不想干？我说想！他又问：“干活快不？”我说除了偷东西不快干别的都快。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史帝文兴冲冲来了，说给我找到一份烫衣服的工作，是他朋友开的服装厂，明天就可以带我去面试。我们全体寓友欢呼雀跃。颜然、大卫和罗伯特早上没工，都说要陪我去。

第二天一早史帝文来，一车五人到Bankstown，著名的越南区。一般的工厂区离火车站都比较远，这一家也不例外，离火车站得走二十分钟。Bankstown离金匙路程短，开车也就是十来二十分钟，可是坐火车就不一样，火车是从另一头走，绕一大圈，或者中途转车，两种选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我想好了，只要人家要我，我就干。这年头找工作多不容易啊！从1988年底到1994年初是澳洲经济最低潮时期。那是1990年，失业率最高时达到11%。唐人街的餐馆一块钱一小时的洗碗工作都有人干，真是哀鸿遍野。厂主是个三十来岁的越南女人，是个不会讲中国话的越南华侨，高个，不胖不瘦，乌黑的长发，皮肤凝脂样的白，眼珠子宝石一样黑亮。